



## 目 录

|                                          |        |
|------------------------------------------|--------|
| 一、关于文化时代和文化软实力问题 .....                   | ( 1 )  |
| (一) 为什么说文化时代即将来临 .....                   | ( 1 )  |
| (二) 文化时代的来临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挑战 .....              | ( 6 )  |
| (三) 文化时代应具有怎样的“文化”视野 .....               | ( 8 )  |
| (四) 国家软实力有哪些构成要素 .....                   | ( 10 ) |
| (五) 软实力在美国崛起的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           | ( 15 ) |
| (六) 我国软实力建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                | ( 21 ) |
| 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问题 .....                 | ( 27 ) |
| (一) 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放在文化<br>建设的首位 ..... | ( 27 ) |
| (二)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难点何在 .....               | ( 35 ) |



|                                         |         |
|-----------------------------------------|---------|
| 三、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问题 .....                | ( 40 )  |
| (一) 怎么理解“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 40 )  |
| (二) 为什么要“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 45 )  |
| (三) 如何“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 54 )  |
| 四、关于文化体制改革问题 .....                      | ( 61 )  |
| (一) 文化体制改革: 为什么改、改什么、怎样改 .....          | ( 61 )  |
| (二) 文化体制改革: 实践中的难点与有争议的问题有哪些 .....      | ( 69 )  |
| 五、关于舆论引导和媒体管理问题 .....                   | ( 78 )  |
| (一) 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遇到哪些新的课题 .....           | ( 78 )  |
| (二)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进行“宣传”的 .....        | ( 81 )  |
| (三) 新兴媒体场与舆论场是如何形成的 .....               | ( 88 )  |
| (四) 应当如何重新界定党和政府与媒体、公众的关系 .....         | ( 92 )  |
| (五) 应当如何理解舆论引导中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 .....          | ( 94 )  |
| 六、关于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问题 .....                   | ( 100 ) |
| (一) 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怎样的战略格局 .....       | ( 100 ) |
| (二) 在国家层面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是否可行 .....           | ( 102 ) |
| (三) 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如何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 .....       | ( 107 ) |
| (四) 发展文化产业为何要重在加强内容的引导 .....            | ( 111 ) |
| (五) 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如何处理主流文化与娱乐的关系 .....        | ( 116 ) |
| (六) 怎样认识和评价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               | ( 118 ) |
| (七) 我们应该制定怎样的文化战略, 以促进中国大众文化的良性发展 ..... | ( 123 ) |
| 七、关于城市文化生态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               | ( 130 ) |
| (一) 研究城市文化生态问题的价值何在 .....               | ( 130 ) |
| (二) 城市文化生态的基本特性是什么 .....                | ( 136 ) |
| (三) 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生态建构的难题与出路何在 .....          | ( 141 ) |

|                                   |              |
|-----------------------------------|--------------|
| (四) 如何理解文化遗产·····                 | (152)        |
| (五) 为什么在当前我们迫切需要保护文化遗产·····       | (156)        |
| (六)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 (159)        |
| <b>八、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 ·····</b>      | <b>(165)</b> |
| (一) 在中国传统社会, 意识形态是如何构建与管理的·····   | (165)        |
| (二) 在中国传统社会, 儒家意识形态是如何传播的·····    | (172)        |
| (三)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形象的演变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 (176)        |
| (四) 如何从人类文明整体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 (177)        |
| (五) 如何从传统文化自身把握其基本特征·····         | (179)        |
| (六) 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 (184)        |
| (七) 近代中西接触以来国人对中华文化发展道路有哪些观点····· | (185)        |
| (八) 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不同有什么文化因素·····      | (194)        |
| (九) 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的文化建设 ·····  | (200)        |
| (十) 乡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体现·····      | (206)        |
| <b>九、关于文化创新问题 ·····</b>           | <b>(210)</b> |
| (一) 当今中国的文化创新面临怎样的历史机遇·····       | (210)        |
| (二) 当今社会推进文化创新的动力是什么·····         | (214)        |
| <b>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和宗教观问题 ·····</b>  | <b>(224)</b> |
| (一) 文化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 (224)        |
| (二) 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挑战·····         | (229)        |
| (三) 宗教文化有哪些基本特征·····              | (235)        |
| (四) 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             | (240)        |
| <b>后 记 ·····</b>                  | <b>(245)</b> |



## 关于文化时代和文化软实力问题

### (一) 为什么说文化时代即将来临

文化时代是相对于经济时代而言的。我们有理由把经济时代的起点定在 1776 年，因为那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它改变了人们对统治或政治的理解；二是蒸汽机的应用，它引发了技术革命的浪潮；三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它提出了关于财富的新的认识从而开启了一扇新的致富的大门。经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这样一种经济世界观：只要把经济学和经济作为社会的中心，作为主导思想来推动个人、机构、城市、地区、国家和国际发展，财富就能得到最大效率的增加，人们在所有生活领域的需求和展望就可以获得最大效率的满足。经济时代，多数国家和政府在为各种经济和非经济事务决策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均为经济发展模型，这种发展模型把人类需求分解为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两类，并把经济需求放在最主要的位置。经济时代，社会中的支配力量是：专业化、产品、生产、资本各界、谈判动机、竞争、技术、集中化、城市化、机械化、消费、消费者至上主义、市场全球化、贸易，以及货币化。经济时代经过长期的演变，在 20 世纪形成了今天的世界体系；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世界和经济发展；世界各国按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消费量、储蓄和投资活动、国民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排列座次；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



虽有种种迹象表明，文化时代将要来临，但就整个人类来说，文化时代仍是一种远景、一幅蓝图、一种趋势甚或一种预言。因此，我们无法像描绘经济时代那样来准确细致地描绘文化时代。加拿大著名文化学者保罗·谢弗认为，文化时代必须奠定在不可或缺的四大基础之上：一是就文化的性质达成总体上的共识；二是扩大，加深对文化的理解；三是树立文化史观；四是加强对文化精髓理论、实践准则以及历史传统的利用。这位学者是这样来刻画文化时代的主要特征的：“在其包含一切的结构中，文化和民族文化、整体论、人民、人道关怀、共享、利他主义、平等、自然资源保护、合作，以及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将获得更高的优先发展地位。这就有可能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其他物种的要求，同时也能够把财富、收入、资源和机会更平等地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同时，这种时代还将把人道主义推向一个更加强大的地位，使地球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得到切合实际的、持续连贯的确立”<sup>①</sup>。

今天，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文化时代来临的种种征兆。

第一，经济时代所造成和积累的负面后果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日趋严重的威胁，人类正在形成新的发展观，而新发展观的灵魂正是文化思维方式。经济时代所造成的最严重的负面后果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在经济时代，自然环境被视为天然的赐予，从来未被纳入到经济学的范畴。这样，一边是经济需求和期望持续地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上升，一边是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森林火灾、温室效应、有毒物质的扩散以及水污染等大量环境问题不断暴露出来。今天，几乎在世界的每个地区都出现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环境的破坏与提高追求高度物质化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伴随着追求高度物质化生活方式而来的，是对世界各类资源的速度惊人的消耗，是贫穷国家、地区和人群对富裕国家、地区和人群的不满乃至敌意的加剧。200多年来，世界不同人群和国家之间在财富和资源的分配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日趋严重。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显示，2000年世界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的30倍，而这一差距在1960年为15倍。在经济时代，国家、政府和企业优先考虑的总是生产、利润、资本、技术和市场，而人和人的幸福和福利问题大多数时候被忽视，人越来越被当作商品、工具和客体来对待而很少享有人作为主体应享有的地位，无论经济上是富还是穷，人类多数在精神上其

<sup>①</sup> 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实都陷入了贫困。为了克服以上危机，人们在最近三四十年里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思考。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通过对影响世界所有地区和国家的五个关键变量（人口、资源、人均工业产值、人均粮食产量和污染）的关注，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论证了在这五个变量中实现“全球化均衡”对于保障人类幸福和环境健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对罗马俱乐部提出的问题给予了认真的关注，突出强调了在所有未来的经济规划和决策中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几乎与此同时，聚集在“选择经济学运动”旗帜下的一群学者，提出了“人性化发展”的口号。到上世纪末，经济学界的一些人提出了“新经济”、“全球经济”、“经济安全”等概念，预测未来将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

第二，“新文化轴心时代”的提出。“文化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上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今天，我们可能处在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正处在世界大转型的过程中，这一转型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命运。在这个命运攸关的历史时刻，我们再次习惯性地回过头去，聆听轴心时代先哲们的教诲，试图从他们那里再次得到智慧的启迪和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答案。但是，这回



先哲们似乎要让我们失望了：我们今天的生存困境似乎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是答非所问。这是为什么呢？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尽管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老子和孔子、释迦牟尼以及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各自代表的文明在历史上都是独立发展出来并且具有相互不能取代的独特价值的，但近现代以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代表的西方文明成了一家独大的强势文明，其余三种文明都明显处于弱势以致于他们的继承者往往数典忘祖，或把自己老祖宗的教诲当耳边风，或干脆就不记得老祖宗说了些什么了。200 余年来，苏格拉底与孔子他们相遇是相遇了，但并未进行平等的对话。苏格拉底一味地滔滔不绝，俨然以师长自居；孔子他们一直是默然相对，偶尔想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总是欲言又止。200 年沉默着的孔子他们，现在还能流利地表达吗？200 年都在大声教导世界的苏格拉底，还能保持那份“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大智若愚吗？200 年一直把苏格拉底视为唯一真理代言人的世界各地的人们，还能愿意听、听得懂孔子、释迦牟尼的教诲吗？今天我们所谓回过头去倾听先哲的教诲，恐怕多数人已习惯了只听苏格拉底的教诲，而西方文明今天之所以陷入困境很可能就与这种文明的设计师苏格拉底、柏拉图脱不了干系，要他们给出脱困的方案，与要他们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有几分相似。其二，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是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无法想像的，因此我们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也不曾为他们所思考过。最近 200 年来，人类历史已从相互隔绝的地域性、民族性的历史转变为统一的世界历史，人也日益成为世界化的“类”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我们的时代，不管叫“全球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还是叫做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文明时期”，归根结底是一个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和仍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的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思想和智慧，绝非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所能全数提供的。在全球时代，过去被千山万水隔离开来的人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住进了同一个“地球村”。从此，人类有着同样的生存空间，同样的生活环境和同样的未来命运。但是，大家初来乍到，还操着不同的语言，揣着不同的想法，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大家身体挤到了同一个“村子”，心却还隔着；大家注定要不停见面打交道甚至共同谋生计，但还是没有一种共同遵循的待人接物和办事的规矩。这村子是按照老子、孔子的思路来定规矩，还是按照苏格拉底、柏拉图或释迦牟尼的思路来定规矩呢？恐怕按谁的都不行。出路何在？出路就在通过相互倾诉和倾听，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形成“地球村”所有人自愿遵循的规矩，所有人乐于共享的精神价值。这就是

堪与人类第一文化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和精神超越相媲美的新一轮的哲学突破和精神超越。从上世纪末开始，人们就在预想第二文化轴心时代的到来。这样一个时代，也许尚在孕育，也许已经诞生。它将是全盘转变人类生存方式的时代，将是文化扮演人类社会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的时代。

第三，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软实力”（也叫“软权力”）的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约瑟夫·S. 奈首先提出来的。他在1990年出版的《命定领导世界》和2002年出版的《美国实力的悖论》两本著作中，都提到“软实力”。他认为，使美国过去赢得世界领袖地位的不仅是超强的军事、经济力量（“硬实力”），而且还有超强的文化力量即“软实力”；今日美国依然可凭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征服他国，但已不能赢得世界舆论，这是因为它的软实力在衰退。在约瑟夫·奈看来，硬实力虽能使人屈服，但无法使人信服；能使人心服口服的只有软实力。相对于经济和军事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是一种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富有弹性和能以柔克刚的力量。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凝聚力、创造力、精神控制力、影响力、号召力，威望、信誉和文化资本。这种力量主要来自一个国家文化中的价值观。十几年来，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和学者反复使用和阐发的重要概念，提高软实力也成为许多国家的自觉奋斗目标。软实力固然不是凭空而生的力量，它的强大一般是与经济、军事的强大相伴随的，它的提升也是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的。但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大并不必然带来文化的强大，没有强大的文化力作后盾的经济、军事上的强盛一般不能持久；而且，与经济、军事力量的提高所要付出的代价相比，软实力的提高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低廉的。在资源、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通过提高软实力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尤为划算和显得必要。

第四，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发展趋势，使得整个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也使得文化产业迅速兴起成为整个经济增长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按文化人类学的新进化论学派的说法，文化是人类利用能量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越是先进，人类人均利用的能量就越多。由此看来，不同社会经济体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主要是由不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的差别所决定的。当今时代，那些发达的社会经济体，经济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文化化了，文化也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经济化了，也就是说，人类过去在生产上主要听命于自然必然性、在消费上主要受制于自身的生物性、在流通上主要受制于地域性的经济活动，今天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已克服种



种自然的限制的自由自觉自为的创造性、享乐性、审美性的文化活动。作为人类利用能量的一种机制的文化，经过漫长的进化之后，终于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点，它所能利用和驾驭的能量已经足以使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发生质变。于是，我们看到了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崭新的文明》一书中所描绘的情景：以科技信息革命驱动的第三次浪潮，正在彻底改观建立在工业革命之上的现代文明，从而使一个崭新的文明初见端倪。于是，我们看到了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所揭示的碾平世界的十大以文化为基础的动力。于是，我们看到了克林顿早在1992年第一次就任总统时的演说中就洞若观火的趋势：全球化，迅速消除旧的工作，创建新的工作；迅速抛弃旧的生活方式，引进新的生活方式；迅速消灭旧的市场，建立新的市场；迅速淘汰旧的行业，创造新的行业。于是，我们不断重复地看到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在《全球社会学》中所发现的事实：在发达国家40%~50%以上的工作是与制造业中和服务业中的知识创造和信息处理联系在一起，4/5以上的新工作创造于这一领域；知识工业的产值在许多国家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半数以上。于是，我们日渐清晰地觉察到晓林、秀生在《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书中所描绘的深刻变化：从满足生理需求到满足心理需求，从“物本”经济活动到“人本”经济活动，从实体经济到广义虚拟经济，从“看不见的手”到“看不见的心”，体现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过程。总之，我们看到了保罗·谢弗在《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一书中所断言的文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处在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历史转折点，必须朝着一个新的时代迈进，这便是文化时代。在文化时代，文化创造、整体论、人民、人道关怀、共享、利他主义、平等、合作、精神文明以及自然资源 and 环境保护，将获得更高的优先发展地位。在文化时代，文化在社会历史舞台上已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配角变为主角；发展最终要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一个国家能否高瞻远瞩、尽早确立文化立国的战略，将决定它在未来世界上的地位。

## （二）文化时代的来临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挑战

文化时代不会自动地把好处平均地分配给所有国家，它不是一场人人可以免费出席的盛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文化时代的来临既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第一，文化时代的来临加剧了我国社会生活中本已存在的“说法”与“活法”的背离。如果我们用于建构秩序和意义的语言工具自身不相洽，就会导致矛盾的情景：或是不属于任何用语言区分的类别，或是同时落入几种类别。在此种情景中，没有一种习惯的模式适用，或是各种模式乱用，结果使人优柔寡断，最终导致无序。现代文明的到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多的现代观念和越来越强烈的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之心，但现代的观念和对现代的渴望本身并不能使现实变得现代，因为现代西方文明是由许多代西方人的生命实践创造出来，而不是由某种观念创造出来的。于是，我们有了身心的分裂：作为社会有机体大脑部分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部分）具有了浓厚的现代色彩，而作为身躯部分的经济基础却仍然主要是古代的；主要由外来文化观念拼接而成的社会理想在不断攻占世界现代性的制高点，而社会现实却由于其沉重的分量而无法随着理想攀升，久而久之，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联系被扯断，社会缺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动力；整个民族的“活法”主要是自己的、古代的，“说法”却是他人的、现代的。

第二，文化时代的来临更加凸显出我国社会“多时态共存”的困境。一个未中断的历史最长、人口最多、近代以来发生的变化最快的国家，其内部的复杂多样一定也是世界之最。今日的中国，就像是一个各个历史时代的人物同台表演的奇特舞台，一个各个历史时代的事物同时展出的陈列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仅是同时存在的思想，而且是同时存在的现实。我们既有“刀耕火种”，又有“神舟五号”。“用品社会”、“产品社会”、“商品社会”、“景观社会”和“符号社会”，在我们这里都可找到踪迹。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统一的法律和政策。我们又是一个内部有着无限多样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很难找到在各处都适用的法律和政策。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困境。

第三，文化时代的来临使中国社会同时面临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三重困扰。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就一直受着现代性的困扰。现代性是伴随“坚船利炮”来到中国的，近代中国的受辱、苦难都与它的到来相关，这使中国人对它怀着复杂的感情。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有紧密的联系，这易让我们把二者视为一物。现代性是突然到来的外国文化，与本土传统矛盾激烈，这使政治精英常常处于两难境地。现代性的到来使中国社会在工业化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被迫超前进行社会组织方式和文化遗产方式的制度化和科层化，造成我国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张力的加剧。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



暴露出的许多负面后果，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扬弃和超越，极易使我们在向往现代性的同时又恐惧现代性，在现代性尚是蓝图的时候就在质疑甚至解构现代性：社会现实的前现代、社会观念的后现代。

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真的启动并有了一定的进展之后，作为历史遗产的前现代性因素的干扰作用就变得分外明显。这些对现代性成长构成严重阻碍作用的前现代性因素包括：皇权思想、官本位以及与这两项紧密相联的政治权力的真理化和文化真理的政治权力化；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把财富首先看作现存的东西而不是有待创造的东西的财富观；分配上强调眼前公平的公平观；处处设法监督、控制个人的社会管理办法；重灌输教条式真理忽视创新的教育理念，等等。

文化时代的诞生与后现代性的成长有紧密联系，而后现代性一经出现就在中国社会获得了一定的成长土壤，并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造成了一定的干扰作用。文化时代的来临，后现代文明的出现，给中国社会形成了所谓“时空压缩”的困扰。从世界的大趋势看，现代文明已进入黄昏期，后现代文明已经开始形成，但就中国的现实看，现代化仍是社会历史的主旋律，也是全体人民的普遍激情，我们已经加入了世界性生存，一方面无法越过现代文明而进入后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受后现代化世界的影响。我们在现代化的门槛前和路途中就遇到了后现代化的种种问题，所以我们要同时面对前现代化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固有问题，而且还要面对三类性质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时产生的文明史上罕见的极其特殊的问题。

### （三）文化时代应具有怎样的“文化”视野

“文化”属于那种最具歧义性的复杂多变的范畴，它几乎涉及生活和社会的所有方面，试图用一个定义揭示它的全部内蕴是不现实的，一切旨在深刻把握文化之意蕴的文化定义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通过不同的视角去观察文化的不同侧面，不失为一种接近文化的“庐山真面目”的有效途径。

从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看，文化可被理解为由自然塑造出来的人反过来塑造自然和自我塑造的过程、方式和结果。从文化与人性的关系看，文化是人类探索和建构自身本质的过程，是人类进化的特有方式和动力机制。动态地看，文化是不甘认同自然之子的命定身份而总想做自然的主人的类，在不停顿的探索中创造意义和价值、实现“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是人类由必然

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没有终点的旅程，是人类在自由的召唤下以自然必然性为舞台演出的追寻应然世界的永不落幕的话剧。静态地看，文化是在人类与自然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中从混沌无序中演化出来的有序结构，是人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压力下，通过自学习、自组织，在适应新环境、求得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复杂适应系统。也可以把文化视为这样一个符号体系，它或者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事物命名并将它们组织在合乎逻辑的系统中，或者给种种事物赋予其本身所不具备的各种意义。从功能上看，无论对整个人类还是对于某个特定人类种群，文化都是维系生存、获取慰藉、凝聚人心的策略系统。若从政治学观察，作为话语、价值观和制度的文化总是代表和维护着某个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在现实形态上，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精神文化的产品是被物化的，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出精神的目的和计划。尽管在思想中把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对讨论问题会有所帮助，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歪曲了事情的真相。文化中的有些部分在时间里只发生变化而无所谓发展，比如不同时代的艺术往往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文化中的有些部分不但经历变化而且经历发展，比如不同时代的知识系统往往有先进落后之分。

我们还可以从许许多多其他视角去界定文化。比如，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文化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独有的生存方式。当强调本民族的悠久历史传统时，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神话。它象征着他们如此之深地相信以致使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在相信的东西。它是使人们所生活的世界看上去有理、有情和可信的东西。再比如，当今天人们谈论文化产业时，文化是指用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中所具有的精神内容。

文化是文明的灵魂，是一种在实践中获得反过来又指导规范实践的日趋丰富多样的价值和认知体系。文化引导人类不断超越现象、个别和当下，进入本质、普遍和久远，是人类的意义之源、力量之源和秩序之源。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特有的历史创造积累和精神记忆，是它特有的生存方式。就一时一事来说，文化的力量也许是弱小的，但就长久来说，文化的力量却是无坚不摧的。来自欧洲北方的野蛮民族曾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了罗马帝国，但最后却被罗马文化所同化。中国历史上，处在未开化状态的少数民族数度入主中原，结果都融入了作为文化民族的中华民族。古人云，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江山要稳固，天下要太平，就得依靠文化的力量。无论是过去朝代国家的政权，还是近代的政治党派，只有在它能够代表某种文化的发展要求时，它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短命的小朝



廷之所以短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在文化上无所依归。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说到底它是它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的兴衰存亡。一切配称伟大的民族，定是那创造了辉煌文化的民族；一切彪炳青史的历史英雄，定是在文化创造中有过非凡贡献的人物。人类历史中的一切终将成为过眼云烟，唯文化不朽。一个团体或社会除了它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一点外，其实并非真正具有生理作用的有机体；它必须要用它的成员的脑和神经去思想、去感触事物。不同社会成员之间之所以能达成共识、合作和协调，秘密就在于他们享有共同的文化。是文化系统提供了社会成员共享的有意义的符号。从而使得不同的个体之间能够相互认同、相互沟通从而协调一致。社会学家指出，当文化提供了社会角色行动的价值规范时，它在社会学意义上就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视角看，社会秩序是通过个体对生活中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文化模式的遵从形成的，而这遵从大部分是无意识的。现代民族国家因应世界性的市场竞争的需要，必须组织为比古代国家更为有序的社会，而给现代社会提供基础性秩序的，正是历史上长时期自发地积累而成的、内化于所有社会成员精神结构中的作为常识、常理、常德、常情的文化。这么一种文化，构成一切现代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一旦缺了它，再好的制度也无法真正实行。

总而言之，“文化，无论我们怎样给它下定义，都是我们所做的和所想的每件事物的中心。文化是我们所做的是以及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的理由，是我们希冀的结果和我们为什么这样想象它，是我们所感知的东西和我们如何表达它，是我们怎样生活和我们以什么方式面对死亡。文化是我们的环境和我们适应环境的方式，文化是我们已经创造的世界和仍在创造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使我们改变世界的动力。文化是我们了解和相互了解的方式，文化是我们的个人关系网，文化是使我们能在社会和国家内生活在一起的图像和抽象。文化是我们生活的要素。”<sup>①</sup>

#### （四）国家软实力有哪些构成要素

今天，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文化的竞争已成为当今国际竞争新的角力场，是国家软实力的根本体现。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战略，可谓意义重大。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

<sup>①</sup> 伯纳德·奥斯特利：《文化引导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要素所体现的“软实力”。重视和提高文化软实力已成为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议题。

### 1.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

美国著名战略家约瑟夫·奈，曾担任过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1995年卸任后回到哈佛大学，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他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国际关系学者之一。1990年，约瑟夫·奈在其著作《谁与争锋》一书中第一次使用“软实力”的提法，随后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数篇文章论述软实力问题，他还在《硬权力与软权力》《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等著作中长篇累牍地论述软实力的重要性。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软实力主要来源于社会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种资源，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和外交影响力。“软实力”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逐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越来越受到关注。

### 2. 中国学者眼中的软实力

软实力学说在西方学术界热起来之后，就迅速波及我国，并很快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和讨论。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1993年就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一文，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就软实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国家软实力包括政治体系、民族士气、民族文化、经济体制、历史发展、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软实力的力量来自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实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

自2003年“中国和平崛起”的话题在国内外热议以后，国内学者从我国和平崛起的角度对中国软实力作了深入研究。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在《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一书中指出，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软力量在综合国力结构中比硬力量更为重要。作为后起的大国，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差距最大的不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而是各种软力量。这些软力量包括内部软力量如制度创新、人力资源、文化辐射力、凝聚力与亲和力、高科技研发能力和外部软力量如国家形象、国际机制的控制力、国际规则的创制力和国际义务的承担能力等。其中政治体制、核心价值观、国家认



同和凝聚力等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张剑荆在《“大国热”冷思考：软实力制胜》一文中，从中国和平崛起的角度论述了软实力在我国发展壮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强大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中国要发展为世界性强国，就必须重视软力量的积累和传播。要将中国影响转变为中国魅力”。

国内学者刘绪华认为，国家软实力包括一国的价值观念、文化特色、诚信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制定规则的能力和动员资源的能力等。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就是要靠弘扬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来凝聚力量。他建议应从四个方面来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一是增强国家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和认同力；二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三是加强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建设；四是通过重大活动来提升软实力。

国内知名学者、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国家软实力是指“一国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政府国内动员力的总和”。国际吸引力是指一国吸引别国自愿效仿和追随的魅力。国际吸引力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家模式的吸引力；二是文化吸引力。国家模式的成功会使一国在国际上树立一种样板效应，吸引别国自愿效仿该国的国家制度，自动向该国政策靠拢。文化吸引力有两个来源：其一是该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上的同质性。它会使文化同质国家之间产生一种亲和关系，使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容易站到一起；其二是该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即这种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广度，这能使异族的人了解、同情和接受其文化观念。国际动员力是指一国为了使别国接受本国的建议和要求而对别国运用非强制力所产生的影响力，它主要来自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友好关系和所拥有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国内动员力是指一国使用非强制性手段所能动员起来的国内政治支持。政府的国内动员力可分为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和对社会下层的动员力两个方面。

在2007年举行的“国家软实力构建与中国公共关系发展高层论坛”上，与会代表认为，软实力包括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以及对于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软实力对内表现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对外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民族文化、外交方针等方面被国际社会认可的程度。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认为，软实力所指的东西，是指文化、教育、法律环境、制度建设、国家的执政能力、管理能力、国民的心

态、国民的形象、民族精神和来自文化传统持久的一种对国民的影响感、凝聚力，也包括文化产品，比如出版物、报纸、电影、电视、语言等这些东西的影响。

在2009年12月举行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国内一批学者对文化软实力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认为，国家繁荣富强主要靠两种力量：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一切可以表现为物质力量的实力都是硬实力，一切可以内化为精神力量的实力都是软实力。硬实力主要体现为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主要体现为文化感染、价值认同、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理论思维、舆论引导、战略策略、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国民形象等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在国际较量中，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而贯穿软实力经纬、维系软实力灵魂的，就是文化。因此，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和长远上看，关系民族兴衰，国家强弱，人民贫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感召力、社会凝聚力、价值吸引力、思想影响力等文化资源。国家文化软实力带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是国家利益的独特呈现方式。国务院台办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认为，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话语权是指舆论主导力。话语传播涉及“说什么”、“谁来说”、“何时说”、“怎么说”等环节。拥有话语权，就能通过议题设置（设计），占据舆论制高点，引导舆论，使之导向有利于己的方向，从而达到宣传塑造形象的目的。为塑造国家的良好形象，谋求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各国无不努力创造于己有利的舆论环境。因此，话语权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新的战略制高点。加强话语权能力建设，扭转话语竞争的不利地位，是话语权处于弱势的国家面临的、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概括的讲，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国力中文化与精神力量的集合体，是国家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国家软实力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是一种凝聚力、向心力、传播力、创造力与生命力，对外是一种辐射力、影响力、吸引力、亲和力与感召力。

### 3. 软实力之后的“巧实力”

正当人们热议“软实力”之际，美国人又提出“巧实力”的概念。“巧实力”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2004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来的，强调在未来美国必须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的



战略目标。2006年1月,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重新思考软实力》的文章,文章称“单独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错误的。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可以称作巧实力。”奈提出,美国必须用有效结合“硬实力”(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的巧实力,变革美国的对外大战略。2007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为首的研究小组发表了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2008年3月,保守主义思想的堡垒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泰德·卡彭特发表著作《巧实力:美国的务实外交政策》,强调美国只有发挥“巧实力”的作用,才能保住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此后,包括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兰德公司(RAND)、“9·11”委员会、美国全球接触中心等智库发表的报告中都相继把巧实力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方向。显然,巧实力战略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

“巧实力”是“软实力”之后,美国高层智库提出的新概念,它已被总统奥巴马所接纳。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阐述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时,称之为“巧实力外交”。实际上,巧实力是综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个整体的战略。希拉里的“巧实力”,就是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未来的美国,既要团结朋友,也要接触对手;既要巩固原有联盟,也要展开新的合作。简言之,“巧”就是要变过分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

美国新政府提出巧实力战略的意图是,修正以反恐战争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寻找到一个新的支点和主线。透过美国战略界的论述,美国的所谓巧实力战略集中在五个领域:一是加大对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关注和投入,提倡“人的安全”的至关重要性;二是强化公共外交,争取其他国家的青年人对美国的好感,推广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三是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地区,让自由贸易惠及全球每一个角落;四是在全球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五是重振传统盟友体系和国际机制的活力,推进各国在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协调,更好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

巧实力战略的本质是“统筹兼顾”,强调要处理好四对矛盾: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平衡、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平衡、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平衡,国内议程和全球议程的平衡。该战略的目的是恢复对美国实力的信心,提高